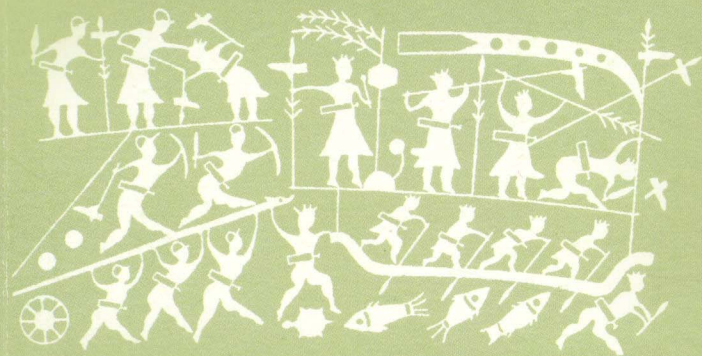




《墨子》城守诸篇研究

史党社 著

中华书局

《墨子》城守诸篇研究

史党社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子》城守诸篇研究 / 史党社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

ISBN 978 - 7 - 101- 07447 - 5

I. 墨… II. 史… III. 墨子 — 研究 IV. B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103875 号

书 名 《墨子》城守诸篇研究

著 者 史党社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¼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07447 - 5

定 价 43.00 元

前 言

墨家是东周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学也曾与儒学并称“显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活于春秋战国之际。《墨子》是墨家学派的著作结集，自墨子时代起，《墨子》的一些篇章就开始成型，西汉后期刘向等人“定著”为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一篇，自第五十二篇《备城门》以下所存的十一篇，内容是讲守城的技术和法令的，一般被称为城守诸篇。秦汉以后墨学衰微，《墨子》也散失了部分篇章，其间只有晋鲁胜《墨辩注》以及唐乐台为三卷本《墨子》的注释，两书皆已失传。至于明清之际，傅山为《墨子·大取》作注，墨学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出现了许多校注著作，而以清末孙诒让《墨子间诂》集其大成。清代以来的校注著作，许多都包括有城守诸篇，故对后者的研究，也当自清代算起。

城守诸篇属于《汉志》所说的“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的兵技巧家著作，但《汉志》所列的兵技巧家著作十三家一百九十九篇，至今都已失传。城守诸篇中的兵技巧著作，大概正是由于入了《墨子》，所以才得以流传下来，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岑仲勉先生曾经说过：“《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的。”但是，在清代以来墨学的“复活”过程中，由于以下因素的存在，致使城守诸篇的研究一直处于冷寂的状态：一是吴汝纶以来的“伪书说”的存

在；二是胡适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就重于哲学，并认为城守诸篇“于哲学没甚么关系”、“不必细读”。梁启超也说，《备城门》以下“十一篇是专言守御的兵法，可缓读”，“而且，我国学人，向来多偏重玄虚，忽视现实，重文轻武，久成陋习，武备方面，更不值得文人注意”（岑仲勉语）；三是城守诸篇为墨家不同弟子各记所闻而成，语言也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文辞古奥，又多军事术语，故意思不容易理解。这个情况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才有所改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为《墨子》全书作注的著作，是清代中期毕沅等人所注的《墨子》，毕注于《墨经》、城守诸篇都有很大功劳，其于《墨子》研究具有草创之功。1948 年出版的岑仲勉先生《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书，采用了清代毕沅、王念孙以来的校注成果，为城守诸篇作了全面的注释，使其在至今可以看到的毕沅注释的基础上，基本可以读通。岑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本专门为城守诸篇作注的著作。

20 世纪初，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河西、银雀山出土了大量汉简，湖北云梦等地也有秦简发现，这些简牍有许多与城守诸篇相似的内容。另外，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还有大量战国秦汉城址、长城、关隘的新材料发表，这使对于城守诸篇的重新研究提供了可能。学者们利用这些地下新出的简牍、考古材料，对于东周秦汉时代的城防技术作了很好的研究，如劳榦、陈梦家、陈直、初师宾、李学勤等人，他们对新出材料的利用和研究，都涉及城守诸篇，这代表了城守诸篇研究的最新进展。虽然如此，与《墨子》的其他篇章相比较，对于城守诸篇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虽然自清代以来，有许多校注著作问世，在内容校勘、注释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城守诸篇本身存在有许多讹、脱、衍、倒、借的情况，现在主要的校勘著作——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吴毓江的《墨子校注》、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叶山（Robin Yates）的《被围攻的城——〈墨子〉城守诸篇的校勘和翻译》等几种，由于对城守诸篇的成书过程那样的基本问题意见不一，在许多地方，上述诸家还有

不同的校勘。我们知道,城守诸篇是墨家弟子各记所闻,最后又由汉人编订成书,各篇之内、前后篇章之间,许多地方都存在着重复的情况,故不应把相似内容轻易连缀。在此方面,日本学者渡边卓的观点最为精当,他对城守诸篇内部的结构、成书有精审的分析,我们的校勘必须立足于这样的认识之上。其二,城守诸篇乃是战国人作品,基本遵循着当时的语言习惯,文字古奥;其中又多军事术语,有的攻守设施器备已经失传,对东周军事情况我们也不完全了解,对城守诸篇的内容,至今并不容易完全搞清。从毕沅到孙诒让、岑仲勉,诸家对于城守诸篇的注释,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起前人,我们可以利用新的简牍、考古资料,弥补某些不足,对城守诸篇难懂的部分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其三,城守诸篇作为存世不多的兵技巧著作,对其内涵的发掘、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个学派的著作,城守诸篇虽然不能完全当作东周军事的实际材料,其中具有理想成分,是墨家对于城防技术“设计”的结果,但城守诸篇仍是研究东周军事的重要材料,是可以适度利用的。对于墨学的源流等等当时的学术状况,也可从中窥见一斑。例如《韩非子·显学》明确记载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当今学者大多以为即东方齐鲁宋卫、南方楚、西方秦等三地之墨;城守诸篇的作者,清人苏时学首先把《备城门》等篇与秦相联系,认为乃商鞅辈所为,历经栾调甫、蒙文通、岑仲勉、渡边卓、陈直、李学勤等人的论证,其成书与秦墨关系密切,已无疑问。

当代一些学者都认识到城守诸篇重要的学术价值,认为其不可忽视,也从不同角度作了一些相当有益的研究。近十余年来,笔者尝试对城守诸篇的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加以探索,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见即将出版的本书的姐妹篇《〈墨子〉城守诸篇校注》一书,此书偏重于城守诸篇的校勘和注释。此处呈现给大家的《〈墨子〉城守诸篇研究》,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在对墨学源流和《墨子》探讨的基础上,对上述第三个方面即城守诸篇的成书、价值作了探讨和发掘。笔者以为,在探讨城守诸篇之时,单纯去谈城守诸

篇,而不把其与墨学源流、《墨子》的其他篇章,以及更深刻的东周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是不能察其实质的。同时,新出简牍和考古材料的利用,也应是十分注意的事情。

对于书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笔者深切希望读者能给予批评,以有利于以后更正和学术的进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墨学的流传	1
第一节 两千年来的墨学——从“役夫之道”到周秦显学,再从“隐没”到“中兴”	1
第二节 关于“墨离为三”	10
第三节 墨、侠之辨	29
第四节 关于墨学在秦的讨论	57
第二章 《墨子》书及城守诸篇	73
第一节 《墨子》的成书及流传、版本	73
附:《墨子》的西译	94
第二节 《墨子》书的地域特征	99
第三节 城守诸篇的结构、成书分析	118
第三章 《墨子》城守诸篇研究述评	133
第一节 清代城守诸篇的研究	134
第二节 民国时期城守诸篇的研究	136
第三节 1949 年以来城守诸篇的研究	143
第四节 中国台湾、日本学者对城守诸篇的研究简介	149
第五节 欧美学者对城守诸篇的研究	154
第六节 城守诸篇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与前瞻	157

第四章 《墨子》城守诸篇的价值	162
第一节 史料价值	162
第二节 学术史价值	164
第三节 对考古工作的提示作用	166
第五章 城守诸篇中的军中迷信散论	168
第一节 迎四方敌之巫术	170
第二节 望军气	175
第六章 城守诸篇与云梦秦简的关系	187
第一节 秦简与《墨子》城守诸篇相关内容比较	187
第二节 城守诸篇与其他秦相关材料的比较举例	206
第三节 结论——城守诸篇与秦简的关系	209
第七章 银雀山汉简中的《墨子》佚篇	210
第一节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二篇的时代、作者 国别和性质	210
第二节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与《墨子》城守诸篇的关系	220
第三节 《尉繚子》与竹书《十二篇》的关系——对于上节主题 的辅助论证	243
附：读上博简《容成氏》小记	253
后 记	258

第一章 墨学的流传

第一节 两千年来的墨学——从“役夫之道” 到周秦显学,再从“隐没”到“中兴”

墨学是产生于先秦时代的著名学术流派。两千多年来,墨学从当初被人鄙视的“役夫之道”^①,进而成长为战国时期与儒学鼎立的“显学”^②,汉以后又复归无闻,直到近代才重新受到关注。在先秦时代产生的诸学术派别中,它的命运是比较波折的。

一、先秦“显学”

墨家成员多出身于社会的下层,可能就是《墨子·尚贤上》所说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农夫与手工业者。墨子其人或本是一个手工工匠^③,故《荀

① 《荀子·王霸》。

② 《韩非子》之《外储说左上》、《显学》。

③ 《吕氏春秋·爱类》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其中墨子自称“鄙人”,可能是自谦,亦或是真实的情况。从墨子总体的思想倾向来说,后说可能是对的。许多学者认为墨子可能出身卑微,如孙中原认为墨子可能是从手工业工匠上升为“士”的。见孙中原:《墨学通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页。

子·王霸》鄙其学说为“役夫之道”。按照《淮南子·要略》的记载，墨学本出于儒，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墨子也推崇尧舜^①。后来嫌儒学“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要求学墨之人，“以裘褐为衣，以跣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②，若不能像大禹那样栉风沐雨，去实现墨家的主张，则不足谓墨。墨家的核心主张，已为论者所熟悉，就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集中反映在今存《墨子》所谓“十论”中，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至于《非命》诸篇。除此之外，墨家还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善辩^③，二是擅长守城技术^④。

墨学的创始人墨翟，大约是春秋战国之际人。在墨子之后，墨家分为三派，并与儒学号称“显学”，在战国时代极一时之盛，《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此时墨学之盛及其地位，可用下三方面的材料来说明。

第一，战国文献对墨家事迹的记载或评述。这些材料，主要在《孟子》、《庄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而以《荀子》最为详细，下面以《荀子》中对墨学的记述为例。

① 《韩非子·显学》也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

② 《庄子·天下》。

③ 墨者善辩，先秦是有名的。墨者本有辩的传统，如《耕柱》所说墨子对于县子硕说“能谈辩者谈辩”，侯外庐先生认为此近乎“名辩”，说明墨家本有重视“辩”的传统（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75页）。还有孟子、庄子、荀子等等对墨家的攻讦，都以墨家善辩为说。如《孟子·滕文公下》“距杨墨，放淫辞”、《庄子》之《骈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胠箧》“钳杨、墨之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也”，等等。《荀子·儒效》把墨子与慎到、惠施、邓析等并称，足以说明墨辩在先秦时代之有名。

④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今本《墨子》中，尚存的自《备城门》以下十一篇，讲的是复杂的守城技术，可证墨家之善守御。

《非十二子》，非“节用”、“尚同”；

《儒效》、《正名》，非墨辩；

《富国》，非“非乐”、“节用”、“非斗”；

《王霸》，非“节用”；

《天论》，非“兼爱”；

《乐论》，非“非乐”、“节葬”；

《解蔽》，非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

《成相》，认为墨家之说非治国之术、非墨家对礼乐的攻讦。

儒、墨战国时代是对立的两派，互相非议攻讦，此儒家荀子（约前 313～前 238 年）对墨之非议就是一例，在《墨子》中也有专门非儒的篇章，即名《非儒》。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的扛大旗者，他对“桀乱天下”的“邪说”、“奸言”都曾加以系统的批判^①。在《荀子》一书中，对于墨学从内容到形式作了全方位的攻讦，几乎涉及墨学的各个方面。这从反面证明，在荀子的时代，墨学是极为盛行的，正如《荀子·成相》所叹“圣人隐伏墨术行”也。

这些记述墨学流行情况的文献，年代贯穿战国中晚期，其中最晚的一种——《吕氏春秋》，不但记载了当时墨学流行的情况，还记载了墨家的一些学说故事。如《当染》说：“（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而《慎大》、《应言》则记载墨子非攻的故事。这些记载都可以说明，至少在战国中晚期，墨学都是流行的，堪为“显学”。

第二，墨学的流传地域。根据方授楚（1889—1956 年）的统计：“墨氏弟子及后学，其国籍可考或得而推测之者，四十人中仅十三人。盖齐人五，楚人四，宋、秦、郑各一，鲁为墨子生地，可见者亦仅一人。吾前已言之：以墨子

^① 《荀子·非十二子》。

之学,既为鲁之政府所不喜,又与儒家相冲突,故不得大行于鲁。墨子晚而见齐太王,并与楚鲁阳文君讨论郑事,其留于二国之时间必甚久,以此从学者必特众欤?”在墨学盛时,墨者分布遍及南北,方授楚因此说:“当墨学盛时,其地理之分布,盖南暨楚越,北及燕赵,东盛齐鲁,西被秦国,四方莫不有墨者。”^①

第三,墨子及墨家钜(或写作巨)子在列国的地位。

早在墨子的时代,墨学就是显学,学说也得到了一些国家当权者的喜爱。如《墨子·鲁问》记载:“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墨子本人也与楚公室鲁阳文君关系密切^②。墨家钜子田鸠曾被楚授予将军之节,然后得入秦^③。还有秦惠王时墨家钜子腹䷔被秦王尊称为师^④,等等。虽然墨家的钜子首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例如墨子曾被楚王以老辞而不见^⑤;谢子入秦,也是费尽周折^⑥。从墨子到以后的墨家钜子,其学说、言行有被赏识、听从的事例,也有被拒绝的例子,是因为毕竟墨家学说的根本,代表的“农与工肆之人”等社会下层的理想,与统治者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不过,墨子、腹䷔等墨家首领钜子在列国毕竟有过风光的时候,这足以说明墨学在先秦曾经的“显学”地位。

① 方授楚:《墨学源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45页。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编第5册影印。

② 见《墨子》之《耕柱》、《鲁问》等篇,以及谢照明、潘民中:《叶公、鲁阳公、墨子关系论略》,《平顶山师专学报》第16卷第1期,2001年。

③ 《吕氏春秋·首时》。

④ 《吕氏春秋·去私》。

⑤ 《墨子·贵义》。

⑥ 《吕氏春秋·去宥》。

二、秦汉——清代墨学的“隐没”

秦汉以后，墨学的地位一落千丈，基本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在墨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黑暗”时期。

有的学者根据汉代有关墨学的评议、记载认为，至少在汉代前期墨学还有相当的学术地位，这是不客观的。在笔者看来，虽然在汉代文献中，也有对墨学的记述，经常儒、墨并称，如《新语》、《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盐铁论》、《论衡》等，但这并不能代表墨学在秦汉以后还有相当高的地位，只能是墨学“衰落”后的回光返照；同时，所谓的墨者的存在，也只能称作墨家“余流”^①，也不能与先秦时代有严密组织的墨家学派相比。

笔者以为，作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学派，学派的衰落，就是墨学破散、衰落之时。在秦统一天下后墨学衰落，当是历史事实。《盐铁论·论诽》说：“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秦统一天下，专任法家学说，思想上趋于专一，诸子学说遭到禁锢，墨学也在其列，所以秦统一之时，就是墨学衰亡之日。何锡光总结墨学衰微原因时说：“随着六国被荡平，随着焚书坑儒，墨子学派无论作为思想方面，还是社会组织方面，都切实地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其不为专制统治所容已成定局。”^②

对于历史上墨学“中绝”的原因，学者们作了种种推测。《庄子·天下》认为墨家之道，“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

① [日]大塚伴鹿：《〈墨子〉の兵技諸篇に關する研究》，东京：大东文化研究会：《大东文化学报》第四辑，昭和十六年（1941年）。

② 何锡光：《论作为社会组织的墨子学派及其历史命运》，《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20卷第1期，2003年。

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陈柱(1891—1944年)认为：“至于墨者之学，则侠也；其自苦既为学者所难能，而以武犯禁，又为法网所甚恶；且其名理异同之辩，已为学术统一后所不需；器械攻守之具，犹为国家统一后所大忌；则其学虽欲不微，其可得乎？”^①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陈柱等从墨学本身找原因，最得其路径。战国诸子学说的命运，在于其学说与环境的适应程度。墨学本身，代表了下层民众的主张，有着先天的“缺陷”，如主张兼爱简约而“上功用，大简约而侵差等”，从而“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②，抹杀了人跟人之间的等级差别，肯定不为统治阶级所喜欢；或崇尚自苦、简约使天下人“俭而难遵”^③，从而“反天下之心”^④；而“非攻”在“战国”又何能行得通？若墨家“佑鬼”则又流于阴阳，此点是战国后期讲求实效的兵家所反对的^⑤。这就决定了墨家的命运。在秦始皇后更为专制的集权情况下，墨学就更无市场。

墨家中绝，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墨家是一个实行钜子制的类似于宗教组织的学术团体，内部分工比一般学派要为严密，这种组织是墨学的特色与存在的基础。在“战国”分裂的情况下，其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土壤，但当秦始皇一统天下、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时候，二者就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组织必为专制政权所不容。况且，自墨子后，墨家本身处于分裂之中，从组织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墨家学派的破坏行为。墨家钜子在秦的风光，就在秦惠王、昭王那个时期，其后不见。由此可以想见，当秦走向专制任法的时候

① 陈柱：《历代墨学述评》，陈著：《墨学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1934年，第169页。

② 《荀子·非十二子》。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④ 《庄子·天下》。

⑤ 如代表兵家主流的《尉繚子》等兵书，见《尉繚子·天官第一》。墨家“佑鬼”的例证，见于《墨子》之《迎敌祠》以及《号令》等篇。

候,墨家组织在秦的命运就必然飘零破散。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使秦王朝的建立,便成了墨家组织命运的终点。其后墨家不可能再大规模、有组织地活动,而只能小规模或转变形式,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古鲁阳——今河南鲁山县一带有“堂匠班”等墨家后裔组织的原因^①。墨家组织的破散,反过来又促使了墨学的衰微。

秦汉时期,统治者或尚法,或谈黄老,或尊儒,都不能改变思想专制这一本质,从思想和组织都与集权统治旨趣不兼容的墨学,当然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讲,汉武帝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而就不能把墨学衰微的“界标”定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时。秦汉之后,这个情况的实质,仍然没有改变,这是千年以来墨学“隐没”的根本原因。从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发现的《守法》、《守令》等《墨子》篇章^②来看,汉代前期尚行于世的《墨子》书,可能只是讲军事的部分,其中原因,推测与西汉前期与匈奴对峙类似大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而阐述墨家“大义”的其他核心篇章,肯定不会如以前那样流行,原因如上所述,就是时势异也。《守法》、《守令》的发现,不足以说明《墨子》全书就流行于汉代,更不可说明墨学还有重要的学术地位。笔者推测,在以后的田野发现中,是不会出现大量秦汉以后的《墨子》篇章,特别是城守诸篇以外的篇章的。

汉代以降,一直至于清代末期,墨学确实处于“式微”的状态。这表现在:第一,与儒、道、佛等比较起来,作为主流思想承载者的官方士大夫阶层,言墨者甚少,更很少有人为墨举张,有的只是韩愈(768—824年)^③、汪中

① “堂匠班”的记载见郭成智、郑建丕:《墨子与鲁山风土》等论著,参郭著:《墨子鲁阳人考论》,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55~63页。又收入萧鲁阳、李玉凯主编:《中原墨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0~358页(后者郑建丕作郑建沛)。

②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

③ 见[唐]韩愈《读墨子》等。韩氏《读墨子》见吴抄本、俞抄本等多种旧本。韩愈对墨家有所褒扬,参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6~261页。

(1745—1794年)^①等个别士人。墨子学说,大部分情况下不是被指为“邪说”,就是默默无闻。第二,《墨子》书也不受重视,校注、研究、整理者稀少,有的只有西晋鲁胜(约公元3世纪后期)《墨辩注》^②以及唐乐台为三卷本《墨子》的注释^③。宋明以后,刻书盛行,墨子因此稍见流行,也有诸如焦竑(1540—1620年)《墨子品汇释评》^④等评点著作。但是,这样的刻本或评点著作,在我们看来,连同清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现的校注、整理著作一样,从本质上来说,都仅仅可以扩大墨学的流传范围,并不能作为墨学流行或“复活”的标志。况且,宋明刻书商业气息浓厚,清人对于墨子的校注,也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支流,多在乎字句,少有的一点义理评说,也是零敲碎打而已。笔者认为,只有对于墨子思想学说核心内容的发挥、探讨,讲求义理,使墨学精髓致用于世,才可称墨学“复活”,而这个过程只有在清代末期以后才真正出现。宋明以来的刊刻、评点著作,以及清人的校注,只是为此作了铺垫而已。

所以,秦汉以后,墨学实际上处于“隐没”的状态,与儒、道等比较起来,墨家学说从来就没有登上历史的前台,更没有在官方思想中张显。然而,这个情况从清代中期开始也孕育着变化,此后出现的众多的校注著作,可以看作这种变化的前奏。

三、清末至今墨学之盛

清末至今,是墨学大盛之时。说其“大盛”,在于学者们重新认识并对墨

① [清]汪中:《墨子序》,《墨子后序》,在汪著《述学》中,《四部备要》收录,又[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附录“墨子旧序”有引,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2001年,第667~672页。

② 《晋书·隐逸传》中仅存其《墨辩注序》,[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附录“墨子旧叙”有引,第660页。

③ [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焦竑《国史经籍考》等。

④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见严灵峰主编:《无求备斋墨子集成》第六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